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现代汉语语法卷

革新与开拓

张豫峰 卢英顺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现代汉语语法卷

革新与开拓

张豫峰
卢英顺
编选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新与开拓/张豫峰,卢英顺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汉语语法卷)

ISBN 978-7-100-15478-9

I. ①革… II. ①张… ②卢… III. ①汉语-语法-
文集 IV. ①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95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革新与开拓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汉语语法卷

张豫峰 卢英顺 编选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78-9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60.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疏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汉语语法理论与方法

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	陈望道	003
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	陈望道	011
谈存续跟既事和始事	陈望道	016
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	胡裕树 范 晓	021
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	范 晓 胡裕树	037
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	胡裕树	050
关于结构和短语问题	范 晓	058

汉语语法描写与解释

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游汝杰	071
论现代汉语现实体的三项语义特征	戴耀晶	084
论句法语义一体化分析中词义的地位	龚群虎	097
语法配价、参与者、价语及介词性价语	杨 宁	111
认知图景与句法、语义成分	卢英顺	137

使动句致使意义实现的机制及其语用价值	张豫峰	149
“都”允准任选词的理据	蒋 勇	166
从存现句的形成看其结构原理	张新华	193
汉语句子否定的类型性质	陈振宇	207
关于“们”与“-s”	陈光磊	236
汉、英主要“事件名词”语义特征	陆丙甫	245
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	张伯江	260
论《春秋公羊传》的语法观	严 修	281
“即”“便”“就”虚化过程中的错项移植	孙锡信	297
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	杨剑桥	312
再论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语义属性 ——基于语篇照应的视角	梁银峰	321
“所到之处”句式源流考	吴金华 王文晖	335
编后记		345

汉语语法理论与方法

一、汉语语法的理论问题

汉语语法的理论问题，是指那些关于汉语语法的本质、结构、功能、发展等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也是汉语语法理论的核心。在汉语语法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汉语语法的内部结构，还要关注汉语语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只有深入探讨这些理论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汉语语法的本质和规律，为汉语语法的教学、研究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

陈望道

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前所加的按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主席的意思是要大家研究文法和修辞。不仅语文专家要研究，而且每个人都应该研究，因为我们要想讲话讲得好，作文作得好，文法和修辞有很大的帮助。文法和修辞将来会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不但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要掌握，一般的人也要掌握，当然专门研究语文的人要更好地进行研究。

一、文法修辞研究虽然不同，但是可以同时进行

文法和修辞是两门科学。修辞比较具体，文法则比较抽象。比如农业的“八字方针”，可以说成“八字宪法”，就是一种修辞现象。修辞研究的条件很复杂。什么是修辞？修辞是利用每一国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手段来表现我们所

^{*} 本文系1961年10月24日在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节要。

说的意思,它要讲究美妙,讲究技巧,但不是凌空的浮泛的,是利用语文的各种材料(语言、文字等等)来进行的。修辞的研究要从具体的运用上去观察,过去我研究修辞常到茶馆、戏院里去听。现在研究修辞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常常开会听报告,有些报告不但政治意义很大,就是对研究修辞也有很大的意义。例如,周总理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幕词,从修辞上讲也是很好的。辛亥革命是失败的,本身没有多少话好谈,因此,有人把它讲到辛亥革命之前去,如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等等,这样好谈的东西就比较多,但和今天不容易联系起来。周总理以孙中山为线索,把它贯串起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山先生在“五四”以后所采取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等等也接连上去,而且可以遥遥接到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讲就很好。这次上海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要我发言,我也大体以孙中山为一条线来谈。这说明修辞不能死守框框,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死抱住辛亥革命,不敢离开辛亥革命来做文章;我们可以讲讲以前的,也可以讲讲以后的,但这和八股文不同。八股文是离开内容来讲前一层、后一层的,我们是为了内容恰如其分来讲前后左右。所以修辞研究总是具体的。修辞不仅语文工作者要研究,学文学的也要研究,甚至更要研究。修辞是介乎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文法研究比较抽象,要抽象到规律上去,要有概括。因此研究文法如果取材过分简单的话,就不足以分析语言的复杂现象。过去日本人曾挖苦《马氏文通》,说《马氏文通》是以西洋的筛子把汉语的材料筛了一通,单把通过筛子的材料拿来用。这就是说他用西方的框框硬套汉语,看起来很清楚,但不能解决问题。学问在乎能够概括繁复的事实,过于简单化,不能概括,就没有多大用处。当然研究修辞也要概括,但修辞研究总是比较具体,而文法研究则比较抽象。

文法和修辞虽然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但是可以同时并进。我们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研究文法的人要研究修辞,研究修辞的人也要研究文法。这两者的

关系是很密切的,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周到全面。

二、确立文法研究,加强修辞研究

修辞的研究应加强一些,开展一些。研究修辞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可以使每个人对于语言的了解更加正确,运用起来更有把握。过去有人把古书解释错了,其中有些是由于不懂修辞,如“三思而后行”中的“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懂修辞,就容易解错。现在有些人的文章常常说,“第一是和平,第二是和平,第三也是和平”、“第一是斗争,第二是斗争,第三也是斗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只有懂得这种修辞的用意,才能正确解释这类现象,也才能正确运用这类修辞手法,因此,研究修辞可以使我们精通语文事实。

修辞中的条件很多,而且很复杂,我们要看清楚关系。在修辞学里,有些语言事实可以从字面上得到解释,有些则不能从字面上来解释。我们对于各种语文事实不能单看表面,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里的“三秋”是指三年,现在我们也常讲“三秋”是指秋收、秋耕、秋种,意思完全不同,必须就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修辞可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消极修辞可以按照字面解释,积极修辞则不能按照字面解释。解放以后,数字用得很多,例如“三反”“五反”“三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边”等等,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分析和调查研究。有些是属于消极修辞的,有些则属于积极修辞。如“万岁”是包括万万年的意思,“百家争鸣”的“百”是指不限于“百”,是多的意思,“百姓”的“百”和“万有文库”的“万”,都是指多的意思。有一次我到农村中去,问农民种“十边”是否恰恰是“十”呢?他们说可多可少,那么那“十”就是积极修辞。修辞现象不管有多少变化,都应该可以解释,可以言传,如“万岁”是指“多”和“无限”的意思,也有欢呼和喝彩的意思。我们懂得修辞就可以更精确地掌握语文的意思,就可以扩大言传的境域。运用起来也可以更敢于进行创造和了解他人的创造。例如我们常

讲“吃绍兴”“吃龙井”，我们也就可以因为南京的干丝很有名，把吃干丝说成是“吃南京”。又如“八字宪法”也可以说作“八字方法”等等。如果我们懂得修辞，就能一目了然了。所以研究修辞可以使我们更正确地理解掌握语文现象。对个人来讲，要加强修辞研究，对国家来讲，也要加强修辞研究。工农业的突飞猛进，语文也就跟着突飞猛进，比如过去收稻叫打稻的，现在用机器来脱粒了，不再打了，于是语文中也就都说“脱粒”，不说“打稻”了。总之，新的事实出现了，新的语文也随之出现。我们应该随时进行研究。

现在进行修辞研究比过去方便得多，过去找材料要到古书中去找，例如“回文”，就只能在古书中才能找到，而现在我们在一般的文件中就可以找到“回文”，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语言”“言语”也是回文。又如“顶真”过去也少见，现在报纸上也有用“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作为大标题了。“双关”以前用得也不多，现在也用得多了，例如《刘三姐》中就有不少双关的例子：

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思）。

哥相思：哥有真心妹也知，十字街头买莲藕，节节空心都是丝（思）。

我最近访问过江西，听到革命根据地一个歌谣：

不费红军三分力，消灭江西两只羊（杨）。

歌谣中的“羊”是“杨”的谐音，意指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用的也是比较特别的析字法。现在找材料容易，有了材料就可以进行分析，概括出规律来。从材料中也可以概括出成功的失败的经验来。解放前上海的“大世界”是个藏垢纳污的场所，人们对它印象很不好。解放以后，就把它改为“人民游乐场”，但改了以后，外宾来上海参观要找“大世界”却找不到了，所以后来又把它改了回来。这恐怕就是失败的经验。总的说来，我们是失败的经验少，成功的经验多。我们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加以研究，就可以贡献一得之见。

我们说确立文法研究，并不是想抹杀过去研究的成绩，而是从过去的研究中确立进取的方向。文法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外国文法学传入中

国以后,对中国文法的研究曾经起了激荡的作用。开始的时候,有人企图搬用外国的文法来硬套中国的语文,但套不进去。几年前,大家争谈尾巴问题,有人说汉语有尾巴;有人说外国有,中国没有。认为有的就大谈其尾巴,认为没有的就干脆取消了词法。看起来这两种态度完全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研究文法必须研究尾巴。研究文法究竟是不是必须研究尾巴,必须认真探讨。我以为文法是研究组织的,文法把各个成分组织起来表示意思。“组织”和“结构”这两个术语要分开来用,“组织”是概括任何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结构”则是具体的组织,比如一个具体的句子的组织就叫做“结构”。近年来讨论“充分地研究”之类组织,有人特别注意其中的“地”,但我们也可以讲“充分研究”,没有“地”而组织还是基本上没有变。因此我们用不着特别重视这个“地”字。确立文法研究方向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过去曾有一个日本人说中国话里没有尾巴变化,不能讲文法,正如一只鸡没有鸡冠就无法分辨雌雄一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鸡冠派”,其见识和孙传芳相差无几。孙传芳禁止妇女剪头发,说剪了头发就男女分不清了。我们认为不但剪了头发还是分得清,就是女扮男装也还是分得清的,戏台上乔装的杨八姐不是终于看出来了吗?过去外国学者认为汉语没有“形态”,是低级的语言,后来有人起来辩护,说汉语也有“形态”,这是善意的,但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讲。打个比方说,外国人认为只有黄头发才是头发,长黄头发的人才是人,我们则说黄头发是头发,黑头发也是头发,长黄头发的是人,长黑头发的也是人。头发颜色在人并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形态”在语言中的地位也是一样。总之,文法研究必须打破以形态为中心的研究法,采用一种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文法,这种新的观点方法要不仅能够研究汉语的文法,而且能够研究外国语的文法。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于敢想敢说呢?也许有一些,但这是根据事实、根据我国语文需要提出的敢想敢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文法研究者必须发挥一点敢想敢说精神来找寻一条研究的出路。出路何在?大家起来找寻,我们是主张用功能(词在组织中

的作用)来进行文法研究的,来建立新的文法体系的。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大道。赞同用功能来研究文法的人慢慢地多起来了,但这个工作还需要大家来努力。

我们主张用功能来研究文法,所谓“形态”,也不是与功能无关。“形态”只有它是功能的标志、表示组织上的作用的时候才在文法的研究上有作用。外国语有“形态”的也可以对“形态”多研究一些。我们讲功能,是把意义和形式统括起来的,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功能是讲各成分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用功能来研究我国语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觉得从功能的观点研究文法前途茫茫,无从着手。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看看各种学问兴废存亡的事迹,就会坚定起来,任何学问都是材料和观点的结合。材料充足,观点正确,就可以成为学问。材料贫乏,观点错误,这门学问就要消灭。要有材料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主张文法革新,反对文法生搬硬套,反对把某些特殊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中国过去讲“形态”的要改,就是有些术语也要改,如所谓“范畴”到底是不是最高的类,不是最高的类为什么叫它“范畴”呢?

从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法,要有更多的人来做,我也曾经做了一点。例如区分词类,《马氏文通》以后,都是按意义(概念)来区分词类的。功能说是在同意义(概念)说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学说往往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法研究中还有形态派,主要是研究尾巴的,也要同他们辩论。方光焘先生是讲广义“形态”的,广义形态也是从关系和联系上讲的,所以也可以归为功能派。功能最近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讲功能是同组织连起来讲的。文法讲语文的组织规律,从小的方面讲,词素组合成词,从大的方面讲,词组织成句子。根据什么

东西可以组织,什么东西不可以组织,什么同什么可以组织,什么同什么不可以组织,来进行分类。这样分出来的类就可以对我们的语言运用起指导作用。

我们讲功能是看分子与分子之间的作用的。功能是组织的功能,也就是各分子在组织上有什么不同的作用。过去有人把代词和副词归为虚词;这是从意义(概念)上来区分虚词和实词的结果。如果从功能着眼,以是否能单独运用,是否能充当句子成分作标准来区分词类,那么副词和代词都是实词。因为从功能的观点看来,虚词不能单独运用和充当句子的成分,这同语音学上区分元音和辅音有点相似。例如“方先生对语言学很有研究”这句话,也可以说:“他对语言学很有研究”,在这两个句子里,如果把“方先生”说成是实词,而把“他”说成是虚词,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马氏文通》以意义来分类,我们要批判它,因为意义分类是讲不通的。“桌子”“椅子”意义不同,但我们都把它归为名词一类。名词是意义的类呢,还是功能的类?“你、我、他”意义也不相同,但我们一般也把它归为一类,可见这样归出来的类,不是意义的类,而是功能的类。我写过一篇《试论助词》的文章,不同意助词是表示语气的说法,有人从意义上看,认为助词没有意义,但从组织作用上看,却很有意义,如“人者仁也”中“者也”等助词在组织上就有很大的作用。在文法上我主张用加法,他们却主张用减法。从功能的观点看,名词和代词可以合为一大类。总之,我们应该从词与词的关系上来看它的作用。还有人对功能说有别的解释,这说明我们的功能学说还有待于严密限定,使人不能随意下解释,希望大家一道来做这种工作。

文法研究从词的用法上来分类是对的。“形态”是功能的标志,如果“子”“儿”是形态的话,那么它也是标志功能的,因此分类必须看功能,因为有些带“子”“儿”的不一定都是名词,还必须看它的功能才能确定它的类。正好像炊事员要戴个白帽子,但不等于戴白帽子的人都是炊事员。这说明功能是主要的,形态不是主要的,如带“然”字的都是副词,但“征服自然”的“自然”就不是副词。可见只有标志功能的形态在分类上才有意义,凭“形态”分别出来的词类,归根

到底还是功能的类。这样讲文法也许比较严密。

三、对研究的初步意见

1. 调查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党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不但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学术上,我非常拥护和佩服。如党提倡调查研究,它的意义就很大。但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否有用,还要看调查方法是否正确。调查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正做学术研究,首先要对调查研究有正确的理解。

2. 研究语文应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过去的留学生往往看不起自己中国人,有一次鲁迅和林语堂一起吃饭,谈到语言问题,林语堂说:“广东人总以为自己的广东话是国语,普通话反而不是国语,有一次我对他们讲英语,他们都肃然起敬了。”听到这里,鲁迅耐不住了,愤然问他:“你是什么东西,拿外国人来吓唬我们的同胞。”鲁迅是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我们语文学界也曾经介绍了许多看不起中国人的东西进来,如汉语是低等的语言等等说法。要有爱国主义也要有国际主义,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今天的中国,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我们学马列主义,学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贴标签,不是为了装门面,不能只在文章前面引几句毛主席的话,而后面就不接气了。我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渗透到学术去,记得在上海有一次学术会议中我曾经说过,要相互勉励,要做到不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而能体现毛主席思想。总之,我们要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加强语文方面的研究,在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努力做一点应做的工作。

原载《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